

# 《钦契恨歌》的弑父与伦理身份研究

## Patricide and Ethical Identity in *The Cenci*

杨玉立 ( Yang Yuli )

**内容摘要：**学界对于雪莱的五幕悲剧《钦契恨歌》的研究不多。在仅有的研究中，对碧娅瑞斯的悲剧解读主要有两种：一种将碧娅瑞斯的弑父和被处死归结为封建专制统治和天主教的压迫；另一种则认为碧娅瑞斯以暴制暴，没有以仁爱感化罪恶，由于采用暴力，才导致了她的悲剧。本文认为，这些解读没有阐明碧娅瑞斯从“顺从”到“反抗”再到“被处死”这一变化的伦理性质，也没有真正彻底解读解释这部戏剧的悲剧性，更无从得出简单浅显情节下作者复杂的伦理及政治经济学观点。本文将《钦契恨歌》与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伦理、政治、经济互为参照，通过文本细读和对文本伦理语境的考察，从“伦理身份”切入分析碧娅瑞斯的伦理悲剧，探讨《钦契恨歌》所隐含的19世纪初期英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伦理焦虑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原因。

**关键词：**《钦契恨歌》；伦理身份；伦理焦虑；弑父

**作者简介：**杨玉立，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助理，主要从事英国文学和西方戏剧研究。

**Title:** Patricide and Ethical Identity in *The Cenci*

**Abstract:** Not enoug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Shelley's five acts *The Cenci* in academia. In the current study, there are two main interpretations of Beatrice's tragedy. From some scholars' perspective, Beatrice's patricide and execut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feudal despotism and the persecution of Catholic. From the others' point of view, Beatrice curbs violence with violence, without humanizing the sinner by love. Her tragedy is due to the violence. Howeve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rgue that these interpretations fail to explore the ethical nature of Beatrice's change from "obedience" to "resistance" and "execution." In addition, they also fail to explain the tragedy of the drama thoroughly and the author's complicated ethical and political viewpoint from the simple plot. Through the close reading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thical context of the text, this paper, with its reference to *The Cenci* with the ethics, politics and econom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Europe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tries to decode Beatrice's ethical trage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identity." It attempts to probe into the implicit ethical anxiety in *The Cenci*, which prevails in British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asons.

**Key words:** *The Cenci*;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anxiety; patricide

**Author:** Yang Yuli, is Research Assistant in English Department,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nd is currently doing research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western drama (Email: 1401036768@qq.com).

《钦契恨歌》创作于1819年，根据罗马钦契恨歌家族的遗稿所记述的史实改编，讲述的是1599年教皇克莱芒八世统治时期贵族少女碧娅瑞斯反抗父亲暴政的故事。碧娅瑞斯和继母兄弟一起密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最终被教皇下令处死。<sup>1</sup>雪莱创作中强烈的革命思想使多数批评家聚焦于碧娅瑞斯对父亲暴政的反抗，认为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19）一样，雪莱创造了一个同普罗米修斯相似的英雄形象，倡导用革命反抗暴政，表达了雪莱的革命思想<sup>2</sup>。但与《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不同，《钦契恨歌》显然是一出融合了众多现实因素的悲剧。雪莱把碧娅瑞斯的反抗看成“致命的错误”，认为碧娅瑞斯弑父表达了道德主题。<sup>3</sup>本文认为，讨论这部作品不能忽视它的悲剧性和雪莱对伦理问题的思考。尽管批评家尝试从不同角度解读钦契恨歌一家的悲剧，但大致说来主要有两种解读：一种将碧娅瑞斯的弑父和被处死归结为封建专制统治和天主教的压迫；另一种则认为碧娅瑞斯没有用仁爱感化罪恶，以暴制暴才导致她的悲剧。本文认为，这些解读没有阐明碧娅瑞斯从“顺从”到“反抗”再到“被处死”这一过程中的伦理本质，无法揭示这部戏剧的悲剧性，也无法从中得出作者复杂的伦理及政治经济学观点。本文将《钦契恨歌》与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伦理、政治、经济互为参照，通过对历史伦理语境的考察，从“伦理身份”切入分析碧娅瑞斯的伦理悲剧，阐明该剧所隐含的19世纪初期英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伦理焦虑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原因。

### 一. 弑父与身份重构

在《钦契恨歌》中，碧娅瑞斯的弑父是同她的身份重构联系在一起的。就碧娅瑞斯而言，她的伦理身份的复杂性在于伦理身份“名”与“实”之间的错位和倒置。换句话说，表层叙事中碧娅瑞斯和他者在言语层面上建立的血亲父女关系，实质上也是统治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碧娅瑞斯在酒宴上呼吁宾客反抗自己的父亲：“这么多仁善明理的人，你们的良知难道都

1 See Percy Bysshe Shelley, *Shelley's Poetry and Prose: Authoritative Texts, Criticism*, Ed. Donald H. Reiman and Neil Fraistat (New York: Norton, 2002) 141.

2 See Stuart M. Sperry, *The Ethical Politics of Shelley's "The Cenci"* (University park: Boston University, 1986): 411-427.

3 See Shelley, *Preface to The Cenci*, 1819.

被一个暴君打败了吗？”(1.3.129)<sup>1</sup>从中可以看出，在碧娅瑞斯语言背后隐藏了一种统治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这种对立构成了文本的另一层叙事结构，即尽管碧娅瑞斯与钦契恨歌伯爵是血缘上的父女关系，但二者之间也同样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政治关系。如果忽略了剧中碧娅瑞斯作为“女儿”的多重伦理身份，我们就无法认识碧娅瑞斯伦理身份的本质，无从理解这出伦理悲剧的意义。

聂珍钊教授指出：“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263》）。在剧中，碧娅瑞斯的伦理身份发生了多次变化。她对钦契恨歌伯爵从爱到恨变化，实际上是她的伦理微分发生变化的结果。她说：“以前，他举起神圣的手将我们打翻在地，但我还是吻过这只手，……面对这一切，我依然忍耐……直到此时此刻……”（1.3.98-110）。碧娅瑞斯尽管饱受压迫，但她能够忍耐，因为她没有忘记自己的伦理身份：钦契恨歌伯爵之女。尽管如此，无论是碧娅瑞斯还是钦契伯爵，他们的身份都在发生变化。正如奥西罗说：“至于说她父亲折磨她，大抵是夸大其词了……可能一回到沉闷的家中，他就变得乖张蛮横，呼喝责骂妻子和子女；于是，女儿们和妻子们管这样的人叫做卑鄙的暴君”（1.2.68-75）。随着碧娅瑞斯和钦契恨歌伯爵矛盾的积累和加深，她在心中逐渐建构起自己新身份，即被压迫者的身份。她把父亲称作暴君，不停地反抗父亲的暴政，希望重新构建自己“自由人”的伦理身份。后来她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因此又获得了一种新身份，即“弑亲者”的身份。最后，碧娅瑞斯为自己的弑父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碧娅瑞斯的反抗并非出于经济抑或政治的考虑，而是源于伦理身份的需要，因为获得自由的前提是推翻父亲的暴力统治。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雪莱把戏剧场景设置在罗马时期，然而文中的伦理、政治和经济生活秩序均是对工业革命时期欧洲的影射。<sup>1</sup>由此一来，我们便对碧娅瑞斯的“反抗”有了重新认识。在欧洲封建社会背景中，封建专制统治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其结果必然导致对它的反抗。

“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在现实中，伦理要求身份同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5）。碧娅瑞斯被压迫者的伦理身份决定了她必须破坏在父权基础上构建的权利体系。在这个权力系统中，她寻求现有秩序的帮助，请求教士奥西诺向教皇呈递自己的申诉状，之后在钦契伯爵的宴会上呼吁主教法官和贵族宾客一起制裁钦契伯爵的罪行。无论是寻求教皇的帮助还是法官和贵族宾客的帮助，碧娅瑞斯的行为说明她依旧寄希望于现有的社会伦理秩序，没有完全抛弃原有的伦理身份的羁绊。随着碧娅瑞斯的成长，父女之间不断加深的矛盾使碧娅瑞斯不得不反抗钦契伯爵的暴力统治。当钦契伯爵对她的迫害达到一

1 本文所引该剧的汉译均采用迈克译：《钦契恨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引文后注明的幕次、场次、行次以此为据。以下引用不再一一说明。

定程度时，碧娅瑞斯就真正走到了钦契伯爵对立面，构建了一种新的伦理身份，反抗钦契恨歌伯爵的暴政也就成了她必然的伦理选择。

碧娅瑞斯同钦契伯爵的血亲关系是先天的、不可变更的，但是她在酒宴上公开反抗钦契伯爵，这不仅表明她正在通过反抗构建自己的反对者的新的伦理身份，而且也导致钦契伯爵的身份改变。钦契伯爵害怕自己的权力被推翻：“暴君们处于时刻被倾覆的危险中，因为既然权力可以通过暴力来获得，那么它同样也可以通过暴力来推翻”<sup>1</sup>。他知道权力被推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仿佛预料到了自己的死亡。他质问卢克丽霞说：“或者，我会遭到指控，被判死刑，而你们都愿意指证我？要是这些都不管用，雇几个杀手，怎么样？”（2.1.138-139）钦契恨歌伯爵在这种威胁下丧失了理智，并将碧娅瑞斯宴会上的公开反抗视作她无视父女伦理关系的表现。钦契伯爵丧失了理智，忘记自己的父亲身份，强奸了碧娅瑞斯。钦契伯爵视碧娅瑞斯为阶级敌人，企图通过对她身体的侵犯镇压她的反抗，“我知道有一道符咒，会让你服服帖帖的”，“我发誓：一定要去做那事，而且一定要做成！”（1.3.179）至此，碧娅瑞斯陷入了伦理混乱中：“上帝啊！以前，我从来不知道发疯的感受；现在，我肯定是疯了！”（3.1.29-30），“这些都是我臆想出来的，不，这些都不是真的！”（59），“哦，我是谁？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哪里？我还记得哪些事情？”（84）碧娅瑞斯选择弑父，企图以这种方式解决伦理混乱问题。由此可见，碧娅瑞斯的弑父是她重构伦理身份和解决伦理混乱做出的努力。

## 二、弑父与碧娅瑞斯的两种身份转换

有一些批评家将碧娅瑞斯弑父的故事解读成道德寓言。显然，这种解释忽略了文本影射的社会伦理矛盾及其背后的经济和权力的作用。碧娅瑞斯从单纯少女到弑父凶手的选择，无疑导致了钦契伯爵一家的伦理悲剧。碧娅瑞斯杀害自己的生父，违犯了伦理禁忌，导致了自己和家族的灭亡，这不仅说明伦理禁忌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而且还揭示了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新旧伦理冲突给个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弑父”是全剧的核心悖论。碧娅瑞斯在钦契伯爵的压迫下选择用暴力推翻暴政，破坏了父女之间的伦理秩序。碧娅瑞斯从小便受到父亲虐待，长大后企图在现有社会秩序中寻求公平与正义，先后寻求教皇、法官主教和贵族宾客的帮助，不仅徒劳无功，甚至还招来残酷的镇压。钦契伯爵对碧娅瑞斯身体的侵犯是致命的。碧娅瑞斯只能选择用弑父的方式去复仇，因此触犯了伦理禁忌而被审判处死。这种伦理矛盾折射出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相对应的伦理秩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合理的旧秩序终将被推翻，但是这又导致碧娅瑞斯陷入无法解脱的伦理困境。她推翻的是暴君，但也是自己

1 参见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马香雪校，商务印书馆，北京，2007，第3页。

的血脉至亲。尽管她在被捕后为自己辩解，认为父亲对她的伤害证明了他不是她的父亲，但父女的血脉联系和伦理关系是不可改变的。碧娅瑞斯作为一个被压迫者寻求出路，她就必须弑父，但弑父本身就是违背伦理“致命的错误”。因此，碧娅瑞斯面临的是一个她无法解决的伦理两难问题。

碧娅瑞斯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和伦理问题：在封建专制统治下，下层民众是继续忍受暴政，遵守传统的伦理秩序和维持这种权力机制，还是顺时而动和彻底颠覆它？碧娅瑞斯的选择无疑是众多下层民众的选择，那便是通过“弑父”改变自己的伦理身份，用暴力革命结束暴政。雪莱认为“弑父”是造成碧娅瑞斯悲剧的真正原因：“以暴制暴，冤冤相报，都是致命的错误。如果碧娅瑞斯曾这样想，那么她会更明智，生活得更好；但若如此，她就绝不会成为一个悲剧人物”（Shelly;1819）。在仇恨的驱使下，碧娅瑞斯有意否定了父女之间的伦理定位，企图建构新的伦理身份。教皇逮捕钦契恨歌伯爵的命令到达之时，也是碧娅瑞斯及同谋的的犯罪被察觉之时。这不是戏剧情节的巧合，而说明封建伦理秩序并未完全崩坏，碧娅瑞斯的弑父不能成为必然。碧娅瑞斯因弑父被审判最终导致整个家族的消亡，可见使用暴力手段破坏既有伦理秩序，代价也是巨大的。

这里有必要对当时英国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进行说明。18世纪的英国，尤其是18世纪后半叶的英国，表面平静，实则不安定因素众多。在政体方面，英国虽然已经由“光荣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然而王权与议会之间纷争不断。在宗教方面，英国新教占统领地位，然而对天主教势力复辟的恐惧依然存在。在外交方面，英国与法国为了争夺在欧洲事务中的领导权，数次兵戎相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从1756年到1763年的“英法七年战争”。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英国虽然没有法国大革命式的变革，社会结构上所发生的变化却是革命性的。18世纪，英国军事政治实力增强，海外扩张的脚步加快，帝国雏形逐渐形成。与此同时，自1760年开始，英国率欧洲之先开始了工业革命。纺织业、运输业、制造业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经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王权没落，连贵族也不复昔日荣光，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工人阶级这一新兴阶级诞生了。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代，英国却保守主义当道，以柏克(Edmund Burke)为代表的思想家、政治家对革命的暴力忧心忡忡。变革带来了焦虑。“这个时代充满迅速的变化或对变化的期待。远在巴黎的街头发生暴力冲突以前，文学和其他艺术就已表达了这个时代的骚动不安。”(玛丽琳·巴特勒:1998)到19世纪初期，工业革命如火如荼，英国资产阶级迅速成长壮大。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无产阶级也在快速成长，劳资矛盾日见尖锐。19世纪最初10年间，北方工业区已发生过多起工人暴动，如1811到1812年间的群众性的破坏机器运动。政府镇压工人运动，造成1819年著名的彼得卢大屠杀。但是，英国工业资本家和大企业主在政治上还未取得绝对统治地位。从外部看，法

国大革命给整个欧洲带来了持续性影响，欧洲各君主国企图对法国武装干涉。1793年3月，英国、俄国等国组成第一次反法联盟，拿破仑一世指挥法国军队开展了抵抗反法联盟的战争。在新旧伦理秩序交替中，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巨大变革，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英国无产阶级都试图运用暴力手段彻底颠覆旧秩序。然而，暴力革命之后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和血腥屠杀，导致暴力革命的正当性饱受争议。

在《钦契恨歌》中，雪莱把弑父和碧娅瑞斯的悲剧命运联系在一起，赋予“悲剧的碧娅瑞斯”这个经典人物新的意义。“弑父”作为一种隐喻，再现的是封建专制和资产阶级这两种政治模式之间的斗争。碧娅瑞斯弑父的过程正是资产阶级暴力推翻封建专制的过程。碧娅瑞斯生活困苦，她因为弑父不仅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还祸及整个家族。碧娅瑞斯的困境正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下层人民政治困境的真实写照。暴力革命的初衷是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但其过程和结果却充满了暴力与血腥。用激烈的革命手段摧毁了旧秩序，但接踵而来的却是暴力、恐怖和屠杀。

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经济结构，加剧了封建专制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同时还催生了新的阶级——无产阶级。经济关系的变化决定了伦理身份的变化，建立在新秩序之上的阶级伦理代替了旧秩序的父权伦理。钦契伯爵的宴会之前，碧娅瑞斯寻求奥西诺的帮助说：“今晚，我的父亲要大宴宾客……晚宴时，我把申诉状给你”（1.2.58），晚宴上，钦契伯爵公开宣称他是为自己两个儿子的死而庆祝，碧娅瑞斯号召宾客反抗钦契伯爵：“我也曾……试图用耐心，爱心和眼泪感化他，……你们的良知难道都被一个暴君打败了吗？”（1.3.101-129），当宾客企图反抗时，钦契伯爵说：“记住了！我要报复起人来，就如同国王用密旨杀人，看谁敢说出凶手的名字”（1.3.81-83）。碧娅瑞斯对父亲称谓的改变代表着二人之间伦理身份的改变。类似“国王”、“密旨”、“杀人”这些字眼，无不向我们展示了统治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从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碧娅瑞斯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上下权力等级关系，钦契伯爵位于权力的上层，碧娅瑞斯和宾客位于权力的下层。其次，支撑和维系这种权力关系的是封建政治宗教体制。随着钦契伯爵父女矛盾的加剧，碧娅瑞斯对父亲的仇恨加深，她的伯爵之女的伦理身份转化为反抗者的政治身份。碧娅瑞斯杀害钦契伯爵是为了构建自己的自由人的政治身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碧娅瑞斯因为密谋杀害钦契伯爵从反抗者的政治身份又转变成了弑父者的伦理身份。碧娅瑞斯在践行其政治伦理的同时违背了血亲伦理，用教皇的话来说，“弑亲的恶逆行径蔓延得如此迅速，那么很快，都不用说，年轻人只有找到一些借口，就都会趁我们打盹的时候，将我们都活活勒死。权威，权力，还有萧萧白发，都成了弥天大罪”（5.4.20-22）。从血亲伦理来看，碧娅瑞斯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因此成了弑亲者。但卡密罗主教等坚持为碧娅瑞斯求情，因为他们认为事出有因，是伯爵灭绝人伦的罪行才让他送

命。这个矛盾的背后隐藏的是资产阶级对封建传统价值的否定。碧娅瑞斯的悲剧不是个人性格使然，而是源于对旧有伦理秩序的彻底颠覆。

### 三、碧娅瑞斯的弑父与政治伦理

雪莱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在为其政治理想而发声，《钦契恨歌》也不例外。当碧娅瑞斯因弑父而沦为罪人时，下层民众为碧娅瑞斯求情希望教皇法外开恩，但以教皇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却坚决判处碧娅瑞斯及家人死刑。碧娅瑞斯用善恶伦理代替了父权伦理，始终“赋予”自己行动正义性。教皇惧怕碧娅瑞斯的弑父破坏了父权，因为父权是宗教政治秩序的基础。碧娅瑞斯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对教皇的统治产生了危害，所以教皇必须严惩。

《钦契恨歌》不仅是对真实家庭悲剧的改变，作者更是借此讨论了资产阶级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冲击，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改变对于人际伦理关系的影响。碧娅瑞斯弑父是工业革命时期法国大革命等暴力革命的映射。造成暴力革命的原因有很多，如经济、政治、宗教、家庭等，但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政治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尖锐矛盾。从碧娅瑞斯的悲剧中，我们看到了被压迫的下层阶级对封建上层阶级势力及其伦理价值体系的颠覆。这种破坏力颠覆了父权和以此为基础构建的伦理秩序。剧中的人物也意识到“碧娅瑞斯可能是无辜的”，但是她最终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在新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建立在“父权”基础上的顺从已经失去了它的伦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碧娅瑞斯的反抗便显得尤为悲壮。碧娅瑞斯伦理悲剧背后的政治原因是十分明确的。雪莱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改编这出悲剧，将碧娅瑞斯的“弑父”和资产阶级暴力革命以及19世纪英国经济和政治运行机制联系起来。由此一来，“弑父者”碧娅瑞斯的悲剧便有了截然不同的伦理起因。

碧娅瑞斯在血缘上同钦契伯爵是父女关系，实际上他们之间也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政治阶级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她遭受的压迫越大，她对同钦契伯爵之间的父女关系的认同也就越小。“暴君”是剧中出现的频率最高的词汇，尽管碧娅瑞斯在血缘上是钦契伯爵的女儿，然而她始终遭到钦契伯爵伤害。碧娅瑞斯和钦契伯爵父女关系实际上已经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政治关系所取代。

正因为伦理身份的错位，碧娅瑞斯没有也不能意识到她和父亲相对立的道德立场其实是新旧两种政治秩序对立的外在伦理表现。她同父亲之间的伦理身份是混乱的，这造成她无法以伯爵女儿的身份在当时的家庭和社会中寻求自己我现在的位置，无法在家庭和社会中得到伦理认同，相反还要遭到父亲的迫害，最后只能因为复仇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我们需要理解碧娅瑞斯作为弑父者和反抗者的伦理两难。弑父者是伦理身份，反抗者是政治身份，无论是伦理身份还是政治身份，碧娅瑞斯都面临两难的伦理选择。从表面看，碧娅瑞斯因为破坏了弑父的伦理禁忌而遭到惩罚。在古代人类的道德

观念产生之前，伦理秩序是依靠禁忌来维系的，禁忌意识约束着人们遵守社会伦理秩序（聂珍钊 41）。但是，社会秩序仅仅靠伦理是无法维护的，它必须通过法律、制度等进行政治维护。实际上，碧娅瑞斯不仅因为对父亲的仇恨从主观上否定了父女之间的伦理关系，而且还试图通过“弑父”构建自由公正的政治新秩序。正如勃克在《对法国革命感想》中表达的观点：社会是在过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不能用强制的办法把它推翻；暴力革命作为一种激进的政治行为，必然导致混乱、无政府状态、恐怖和独裁。碧娅瑞斯弑父表面上破坏了当时的社会伦理秩序，实际上却提出了政治秩序这个更重大的问题。碧娅瑞斯这个人物的社会价值在于破坏了当时伦理秩序，但是从她针对一个阶级的反抗而言，她的更大的价值在于破坏了当时的政治秩序。

尽管雪莱笔下的碧娅瑞斯犯下了弑父的大罪，然而在教皇看来，她破坏社会秩序的政治罪行更大。在戏剧的话语中，“父亲”、“暴君”、“女儿”等字眼随处可见，这说明在碧娅瑞斯心中伦理同政治是纠缠在一起的。面对父亲不停的压迫，父亲已经推动了父亲的意义，变成了仇敌，变成了政治迫害者。父女伦理已经被政治伦理取代，所以她才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才导致她用最血腥的暴力复仇。可以说，血亲伦理和政治伦理结合在一起时，变成了碧娅瑞斯弑父者的强大动力。

碧娅瑞斯的弑父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伦理两难问题：一方面她追求自由和正义，认为弑父是除恶扬善，另一方面她又承认，自己走上了岔路。但是，她自己无法解决自己面临的伦理选择问题，也无法从伦理和政治的两难选择中摆脱出来。在英国文学传统中，碧娅瑞斯变成了一种伦理和政治符码，这种符码具有各种模糊不清的二元对立：否定和肯定、存在和缺场、隐瞒和揭示。从 16 世纪罗马直到今日，对碧娅瑞斯故事的不断改编和讨论再现了人这一符号，让我们去思考伦理选择过程中伦理身份、伦理秩序、政治伦理等问题。尽管《钦契恨歌》和中世纪道德剧在主题和形式上都存在关联，然而雪莱的改编目的并非为了传达救赎的主题，也有别于对恶势力的普世性批判，而在于揭示早期现代英国社会伦理秩序的混乱和社会政治关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通过对碧娅瑞斯这个悲剧人物的描写，戏剧反映了人民大众从政治上对于暴力复仇和暴力颠覆封建专制压迫的质疑。然而，在这种质疑的背后，全剧展现了资本主义对于近代英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大众心理的重要影响。社会发展催生的暴力革命无情摧毁了以“父权”为基础的、以顺从为特征的封建伦理，但暴力革命之后的严重后果又使人怀疑暴力革命的正当性。

雪莱笔下世俗的、英雄的、反伦理的碧娅瑞斯形象，也折射出这一时代的集体性伦理焦虑。碧娅瑞斯的“弑父”是个人面对压迫和暴政的英雄行为，表现了 19 世纪早期弥漫在英国的一种普遍焦虑。这种情绪与日益加大的阶级矛盾相关。威廉四世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经济关系的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各



阶层的政治生活方式,更是强化了新旧伦理秩序的矛盾和对立。戏剧借由不同戏剧人物反映了“弑父”式的反抗与变革所带来的不安与焦虑。这种焦虑一起隐藏在法国大革命对英国社会的持续影响中。在英国阶级矛盾日益激烈的时期显得尤为明显。碧娅瑞斯作为一种政治符号,个人的意义减小了,被雪莱赋予了新的更大的政治含义。旧的伦理秩序从政治上被彻底颠覆,新的政治秩序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被重新建构。由此看来,碧娅瑞斯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弑父者”符号,而是一个构建新秩序的政治符号。

### Works Cited

-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马香雪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 [Bukhardt, Jacob. *Italian Renaissance Culture*. Trans. Hexi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7]
- Donahue, Joseph. *Dramatic Character in the English Romantic 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70
- Harrison, Margot. "No Way for a Victim to Act?: Beatrice Cenci and the Dilemma of Romantic Performance." *Studies in Romanticism* 39 (2000): 187-211,189
- Henderson, Andrea. *Romantic Identities: Varieties of Subjectivity.1774-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6.
- 李增,周琴:“雪莱《钦契》的文类及文类政治研究”,《东北师大学报》6(2011):110-112.
- [Li Zeng, Zhou Qing: "A Study of the Genr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Genre in Shelley's *The Cenci*."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6(2011):110-112.]
- Shelley, Percy Bysshe. *Shelley's Poetry and Prose: Authoritative Texts, Criticism*, ed. Donald H. Reiman and Neil Fraistat. New York: Norton, 2002
- 聂珍钊.2014.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Ethics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珀西·比希·雪莱:《钦契恨歌》,迈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 [Shelley, Percy Bysshe. *The Cenci*. Trans. Mike. Beijing: Zhongxin Press,2014]
- 查尔斯·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 [Tilly, Charles *European Resistance and Democrac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